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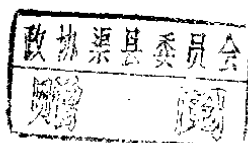
渠县文史资料

第一輯



1414/29
渠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渠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责任编辑：欧汉英 杨多贵

封面设计：蒋建有

渠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渠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四川省渠县印刷厂 印刷

内部发行

印数：1000册

封面题字：章继肃

序

李 芳

渠县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史资料资源。近年来，由于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开拓，深入挖掘，推出了一批多姿多采的文史资料。经整理，首辑《渠县文史资料》呈现在眼前了。它的问世，表明政协文史工作的良好开端，可庆可贺；它的结集，凝聚着撰稿者和编辑者的辛劳，可赞可叹。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搜集、整理文史资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它不仅可弥补档案之不足，而且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丰富而有价值的近代史资料。达到借鉴历史经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目的。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贯彻执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方针，注重征集，慎编选辑。征集中尤应抢救“活资料”。编选中，首要着眼辑入近代有价值的亲见、亲闻、亲历的史料。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首要之责，是为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作出自己的贡献。努力为改革、开放服务，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服务，为发展生产力服务，

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翻阅《渠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十七篇文章，颇有其鲜明特色。特色之一是翔实。入选者多是“三亲”之作。特色之二是有个性。它既别于地方党史和志书，但又有一定联系，个性独具。特色之三是价值高。它汇集了我县近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丰富了政协文史宝库。

《渠县文史资料》第一辑问世，可算是个新起点。可以预期，它的多册续辑将在未来的历史岁月中相继出世。也可以相信，有着全体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培育，《渠县文史资料》之花，定能在两个文明建设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结出丰硕之果！

目 录

序	李 芳 (1)
渠县概况	杨多贵 (1)
访魏传统同志记	何修荣 (3)
立信发财	陈开弟 (9)
渠县抗日救亡综述	欧汉英 (11)
抗日战争时期的渠县民众教育	邓天柱 (23)
新市武装斗争一瞥	段景鄂、杨绍培、杨宗炎 (30)
历史的回顾	段景鄂 (34)
在舆论阵地上的一场斗争	陈见昕 (39)
对国立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 的片断回忆	张代耕 (50)
渠县男中女中罢教纪实	姜怡华 (53)
街	陈见昕 (55)
杨鹏升二三事	文世安 (62)
清代《严禁婪索碑》	王建纬 (68)
三汇文峰塔	徐浩昌 (72)
解放前渠县船帮组织概况	张 扬 (75)
乡绅美梦二则	<u>唐亚衡</u> (78)
吴佩孚夜宿三汇镇	<u>唐亚衡</u> (80)
政协渠县委员会一至七届主席、副主席、 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81)
渠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人员名单	(87)
征稿启事	(88)

渠 县 概 况

杨多贵

渠县位于川东达县地区西南部，东邻大竹，南接广安，西连蓬安、营山，北界平昌、达县。幅员面积2013平方公里，辖14个区，两个区级镇，4个乡级镇，79个乡。总人口123万。耕地面积99.94万亩。

渠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为“賁国都”，秦始置县，称宕渠县。西魏文帝十三年（公元547年）改宕渠县为流江县。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流江县为渠县至今。渠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史。1933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渠北的7个区48个乡创建了苏维埃政权。1948年秋，在川东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龙潭起义。

渠县地处浅丘，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早在汉代就因农业、文化发达而被列为“上县”。解放后，经济恢复发展很快，1987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30522万元，粮食总产量达41060万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2.2倍和1.7倍。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占总产量的60%以上。多种经营项目多，发展快，黄花、柑桔、油桐被列为全国生产基地，生猪、蚕桑、苧麻、甘蔗、花生是全省的生产基地。特别是渠县黄花，久负盛名，产量居全省首位，品质优良名列全国前茅，畅销国内外。

渠县工业拥有电力、纺织、采矿、化工、建材、酿造、制革、食品、机械等一百多个品种四百多个企业，有三十多个名优产品驰名中外，畅销不衰。198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31729万元，比1949年增长34倍。

渠县地下资源丰富，有煤、石油、天然气、石灰石、石膏、钾矿、石英、膨润土等。特别是固体岩盐藏量丰富，据地质部勘探资料预测，总藏量达万亿吨，且具有“层位多，规模大、矿层厚、资源富、品质优、保存好、开采易、交通便”等优势 and 特点，是我省规模最大并为全国罕见的巨型富矿。省计经委已批准兴建年产五万吨的真空制盐工程。

渠县素有“酒乡醋庄”之称，“渠江红桔酒”、“渠江广柑酒”、“濛山头曲”、“濛山陈酿”等十多个产品分别进入国优、部优、省名优酒行列。“三汇果醋”系国内首创，属醋中珍品，“三汇特醋”有三百多年的生产历史，系全国十大名醋之一。

渠县交通方便，襄渝铁路由北向南纵贯县境62公里，有六个火车站。川鄂公路东西横穿，与区乡公路连结成网，四通八达。巴河、州河在三汇镇注入渠江，流经县境一百余公里，四季通航。

渠县是全国汉阙集中最多的地方，有六处汉代石阙，列为全国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阙建筑雄伟，雕刻精细，图案优美，造型逼真，为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珍品。位于华蓥山脉北段西麓距渠城13公里的龙潭风景区，竹山林海、郁郁葱葱；神话般的老龙洞座落其间，大小溶洞成群，石林秀丽多姿，景观别致，引人入胜。

访魏传统同志记

——魏老卅年代初在渠县的革命活动

何修荣

1981年初夏，我和何文藻、赵搏同志因事去了北京。6月16日下午，我们到北京城外团结湖，赴中央乐团李凌、人民大学陈云枫二同志之约，在那里得知魏传统同志在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艺术学院工作，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职务，家住西单区新文化街5号。晚餐后，我们同李凌同志一道乘车转回城里，在民族文化宫下车与李凌同志道别。那时已是日薄西山、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三人步行到新文化街，离街口不远便是魏老的住宅。到门前向门房说明了我们是从小四川省达县专区渠县来京拜访魏传统同志的。门房通禀后，随即请我们进去。魏老的住宅是一所北京的四合院。我们走进院坝里，魏老已经站在正面堂屋的门口，他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三个家乡来客，引我们在堂屋右侧的书房就坐。书房陈设简雅，除书桌、书橱外，中间有一张比普通餐桌还大的长方桌，电视机陈设在书房另一端，壁上挂有郭沫若同志书赠魏传统同志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下联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坐定之后，我们一一自我介绍了姓名。我向魏老出示了渠县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并说明我们拜访魏老是为了征集渠县的现代革命史料，意在起“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要求魏老抽时间回忆撰写三十年代初期在渠县三汇一带干革命的史料。魏老听后满面堆笑地说：“你们不要急，喝喝茶，

休息休息再谈”。他首先讲：“我对渠县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他非常关怀地询问了解放后渠县的变化情况，并亲切地问了我们三人的年龄、所在工作单位、职务和退休与否。

深厚的乡亲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简要地作了回答。魏老说：

“我今年73岁了，回忆录是必需写的。可是我现在学校工作很忙，每天一早坐车到海淀区艺术学院去，很多事要处理，午后回家也较晚，我是刚才回家的。确实没有时间，只好等以后再写。关于我在渠县的情况，我们谈谈好了”。我取出了笔和笔记本，于是，魏老一边谈，我一边记。

魏老当时虽已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谈锋很健。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往事：

“回忆起在渠县的情景，虽然几十年了，但犹历历在目。

那是1931年12月，组织上派我到渠县的三汇镇去，计算起来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为什么要到三汇？这就需要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和当时的形势”。他激动而又感慨地接着说：“我是达县（绥定）蒲家场人，1925年我和张爱萍都考入了达县中学（原绥定联中）读书，与杨辉如（渠县三汇镇人）等同学甚为友好，关心当时的时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不少地方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残酷迫害，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当时一部份进步青年学生，由于我国‘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深远影响，思想觉悟较高，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官僚在中国相互勾结，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以致民不聊生，国如垒卵。这些青年不满现实，忧国忧民。蒋介石‘四·一二’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他们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于1928年（当时20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达县的地下组织”。

“我入党后，即离开家庭，献身革命，在达县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我身份暴露，站不住脚。为了避免反动的军政当局下毒手，所以中共达县临时县委指示我转移到渠县三汇去。当时，达县是封建军阀刘存厚的驻防区，渠县是另一军阀杨森二十军的驻防区，而三汇位于达县与渠县之交界处，水陆两便，比较热闹，既有利于隐蔽身份，又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此外，还有与我要好的同学杨辉如是住在三汇的。”

“1931年12月，我去到渠县三汇镇，先与杨辉如联系上。经杨介绍又认识了许仲欧、冉仲愚、肖清帆、秦子和等人”。何修荣插话：“这些人都已经去世了”。魏老接着说：

“1932年初，我的爱人李国兰同志从成都也来到三汇。这一学期，许仲欧当三汇小学（完小）的校长，我任训育主任，我爱人也在那里教书。三汇地区产红桔，是鱼米之乡，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为了开展革命活动，我以三汇小学为据点，以杨辉如、许仲欧、肖清帆等为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我们在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当时如王藻翔、王凤锡等等学生加入了读书会。我们借此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后来又在离三汇不远的龙会沱（与达县交界）组织了读书会，搞学生运动。我当时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所组织的《创造社》的成员，给青年学生介绍了《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书刊和《社会发展史》等书籍。那时，学校里每周要开一次周会，我是训育主任，就借此机会给学生讲话，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军阀割据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讲‘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中国的种种罪行；讲社会发展史，宣传为什么要反帝、反封建的道理，传播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我还组织过篮球队，我作领队，带他们去

广安县参加比赛。这些活动，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因而不少学生对我非常敬重”。谈到这里，魏老一下子想到了临巴溪这个地方。他问：“我带领学生去广安，曾几次路过临巴溪，那里河边馆子里的‘蒸鸡’、‘蒸蛋’很有特色，是很有名的，不知现在如何”？何文藻和赵傅同志插话：

“我们都家住临巴，原来那里河边卖的‘蒸鸡’、‘蒸蛋’确实是很有名的，但馆食业集体化后，安排不当，河边没有馆子了，食店大都集中在街上，‘蒸鸡’、‘蒸蛋’现在还有，可不具有以前那样的特色了”。

魏老又继续谈开展工作的情况：“我深知在旧社会要开展革命工作，如果没有当地的中上层人物的同情和支持，那是会困难重重的。我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中间派，通过杨辉如、许仲欧等等的关系，与当时三汇的头面人物黄师善认识，并逐渐友好；又与当地的一些有名望的老年人来往，谈书法，讲历史，联络感情；又以给别人写字的办法，联系群众。因此，三汇的石印铺经常找我写这写那，有时还专门请我用正楷写名片”。谈到这里，魏老指着书房中央那张大长方桌说：“现在北京还有不少人经常送纸来请我写字，不便推却，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在那张桌子上写一大叠纸，站着写，一写就是两三个钟头，我还能支持住。前不久，渠县三汇小学来信请我给他们写该校的横额，我已写好寄去，不知收到没有”？何修荣插话：“听说已经收到了”。魏老接着讲下去：“当时三汇有个邮政分局，我设法与那个局长搞好了关系，利用他以便获得灵通的消息和传递进步的书刊。为了掩人耳目，当时三汇的哥老会，我也参加应付。在搞好群众关系以后，我与杨辉如商量，利用他与三汇的一些钢厂、煤厂的股东熟识的关系，经常一道去各个厂里玩，与一些工

人接近，借机会讲时事，宣传革命的道理，搞工人运动。那时，二十军杨森有一个独立旅驻扎三汇，队伍里有中共党员，我与他们挂上了钩，一起活动，搞军运。赵孟明同志当时也在三汇地区进行过地下革命工作”。

“1932年下学期，肖清帆任三汇小学校长，我仍任训育主任。我考虑到我俩夫妇都在一个学校教书，万一发生意外，很不好办。因此，通过杨辉如的关系，将李国兰同志转移到了丰乐小学去教书。李到那里，首先也组织了读书会，并与学校附近的农民接近，渐渐熟了，就在农民中宣传革命思想。这年秋天，张觉仁同志夫妇转移来三汇，住我家中，被反动分子国家主义派皮容川向杨二十军告发，说我同张有共党嫌疑，因而我与张觉仁同志都被抓去，关押了二十天”。何修荣插话：“皮容川这个人我认识，品德很坏，思想反动，他还抽鸦片烟”。魏老接着说：“我们被抓以后，杨辉如和读书会的一些学生，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后经读书会的成员王藻翔恳求他的父亲王典午（县里有名望的士绅，当时任三汇的教育委员）大力担保，说我是一个好教师，并非‘异党’，我们才被释放出来。张觉仁同志后来又被二十军抓去，被杨森枪杀，牺牲在广安”。

“1933年上期，我从三汇转移到丰乐小学教书，与李国兰同志一起工作，在丰乐附近一带搞农民运动，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群众关系搞得很好。后来张明哲被抓叛变，那时丰乐的团总（即乡长）王守谦掩护过我。可惜，王这个人后来被镇压了。我们在那里开展工作，渠县岩峰的徐聊生同志曾来与我联系，大竹地下党也曾派人到丰乐来联系。当时，丰乐成了渠县地下党活动的中心”。

“1933年下年，红四方面军到了川北一带，陈世才部打到了渠县境内。我奉中共达县临时县委的指示，同李国兰同志一道调回了达县工作”。

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魏老讲述他在渠县的革命历程，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九点钟，耽误了魏老的休息时间。我们向他致谢告辞。魏老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外，与何文藻、赵傅同志和我一一握手道别。

（何修荣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立信发财

陈开弟

解放前，渠县城的商业活跃，是粮食、禽蛋、黄花、折烟、油桐、山货、药材等农副产品集散地。当时，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本地人仅有王光举、王钦贤、郑仕竹、罗必祥。除此之外，主要是外来的重庆帮、合川帮派驻渠县扎庄的“庄客”，专门经营土特产品，雇木船运往重庆（渝），合川（合）销售，有的买食盐转渠。关于棉布、绸缎、百货等，也多是南充（顺庆）帮、广安帮占领市场。资金较为雄厚，在商业中比较正规的本地商人鲜中益的“鲜记国货商号”，可算一个象样的百货店。无论是外埠或本地的座商均系零售，没有批发。此外，多系小本经营的夫妻店或沿街摆摊的小贩，尤其饮食行业较多。

在旧社会的商场中，渠城的商人以土产运销的竞争为甚，特别是外地来渠的庄客与本地运销商的竞争尤为激烈。他们互相排挤，尔虞我诈，并在筹集资金上各显神通。其方法是：以每月十五或月底为交款比期，按交款地定名，如重庆交款称“渝票”，合川交款称“合票”。即渠县某商号某经理出据一张条子，注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市某街某号某商号取款多少元。渠县每百元只收八十五——九十元左右。这样，渠县的座商均愿意买“渝票”，将此条拿到重庆取款进货，既可得10——15%左右的优惠，又可不带现金，到时提款进货。出据者看来吃亏，而实际是有利可图。因出据者把卖“渝、合票”所得的现金，立即在渠县购买土产，用船运往重庆或合川，大体接近比期运到，卖货付款，讲信誉。

由此可达到“借鸡下蛋”、“以骨熬油”发财的目的。即使货还未到，为了信誉，他们在重庆、合川的伙计可向银行、钱庄融通资金，到期付款。只要不遭致其他意外，赚钱是伸手可得的。

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只得大量发行法币——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但这并不能挽救其经济危机。在物价瞬息万变的日子，商场中的竞争注重保存实物，以物取胜。渠县的王钦贤，原来是一个较为贫寒的斋公，经过几年的商场竞争，眼看受到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变的威胁，他将运至重庆的土特产销售后，立即购买黄金、“洋纱”，或以物易物，做到保本保值，并力求增值。到1949年他竟成了拥有200余挑田土和三百多两黄金、数千银元的土绅兼商人，还娶了两个老婆。临渠县解放，他放弃经商，隐退农村。这是一个以信誉取胜大发其财的典型。相反，只注重销售，忽略储备实物，其结果金额增大，而实际库存商品大大减少，再经过几个“比期”的折腾，实物就会由多变少，加之不讲信誉，经营就无法维持，最终只得宣布倒闭、破产。当年渠县经营粮食运销业的熊继销就遭此厄运。